

国家战略视域下民族“三交”的场域重构与共同体意识培育 ——以海南为例

王鹏^{1,2}, *皇甫政彤^{1,2}, 宋波¹

(1.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海口 570100; 2 领楠科学技术研究院, 厦门 361015)

摘要: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 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场域。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全域自贸港, 海南多民族“三交”(交往交流交融)的场域形态在封关运作背景下正经历深刻重构, 这一过程不仅关乎海南本地的民族团结, 更为全国开放型民族地区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样本。本文基于场域理论与共同体理论, 将海南置于国家战略视域下, 系统梳理多民族“三交”的历史脉络, 剖析自贸港制度创新对物理、载体、互动及文化场域的重构机制。研究发现, 自贸港建设在拓展“三交”空间的同时, 也面临场域融合不足、文化认同差异等现实困境。据此, 本文提出适配高水平开放环境的“三交”场域优化路径与共同体意识培育策略, 旨在通过海南实践, 为探索开放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借鉴。

关键词: 海南自贸港; 多民族“三交”; 场域重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治理

基金项目: 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 XLYXW2026045)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7.586

引言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是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在这一国家战略背景下, 如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度融入自贸港建设各领域, 不仅是海南一地的任务, 更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对于全国其他开放型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海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 汉族、黎族、苗族、回族等 56 个民族齐全,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18.3%。长期以来, 海南各民族形成了“共生共荣、守望相助”的“三交”传统。然而, 随着 2025 年 12 月 18 日全岛已完成封关运作, 自贸港在税收、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深刻改变了传统的民族聚居格局与生产生活方式。人口流动的加剧、产业集聚的加速以及文化交融的广度提升, 使得多民族“三交”的场域载体、互动方式与核心内容发生系统性重构。这种重构既带来了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新机遇, 也引发了场域融合不足、文化认同差异等新挑战。

当前学界关于民族“三交”与共同体意识的研究, 多集中于传统边疆地区或封闭型民族聚居区, 针对“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民族地区治理”的研究相对匮乏。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战略的“试验田”, 其民族工作实践具有独特性与前瞻性。立足自贸港建设背景, 系统研究海南多民族“三交”的场域重构与共同体意识培育, 既是响应国家民族工作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 也是探索开放环境下民族治理现代化路径的现实需要。

因此, 本文试图突破单一地域视角的限制, 将海南案例置于国家战略视域下进行考察。基于场域理论与共同体理论, 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实际, 深入剖析自贸港建设对多民族“三交”场域重构的核心影响, 探究场域重构中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现实困境, 最终提出适配自贸港发展的“三交”场域优化路径。本研究期望通过总结海南经

作者简介: 王 鹏(1996-), 男, 硕士, 经济师、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评价学、管理学、经济学等;

皇甫政彤(1989-), 女,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数据分析, 社区教育等。

通讯作者: 皇甫政彤

验，为全国同类开放型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可复制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图1 少数民族姑娘合影

一、海南多民族“三交”的历史脉络与自贸港建设前的场域特征

（一）海南多民族“三交”的历史脉络

海南多民族“三交”的历史源远流长，贯穿于海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与“三交”特点，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逐步形成了“共生共荣、守望相助”的“三交”传统，为当代多民族“三交”场域重构与共同体意识培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古代：自发共生型“三交”阶段

海南古代的多民族“三交”，以黎族为原住民，汉族、苗族、回族等民族逐步迁入，形成了自发的共生型“三交”格局。早在新石器时代，黎族先民就已在海南岛定居，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黎族文化（黎锦、船形屋等）。秦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海南的管辖加强，汉族先民开始迁入海南，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与商贸活动，与黎族先民在生产生活中相互接触、相互帮助，逐步形成了简单的交往互动——汉族先民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入黎族地区，黎族先民则向汉族先民传授热带作物种植、狩猎、纺织等技能，形成了“互补共生”的交往关系。

唐宋时期，海南的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大，更多的汉族人口迁入，同时，苗族先民主要从广西、贵州等地迁入、回族先民主要从阿拉伯、波斯等地经海上丝绸之路迁入，逐步定居海南，形成了多民族共生的格局。这一时期，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范围逐步扩大，从生产领域，直到文化、生活等各层面，并且汉族的儒家文化、科举制度也渐进式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也逐步影响汉族群众，各民族在饮食习惯、节日庆典等方面相互包容，形成了初步的文化融合。例如，黎族的“三月三”节日，逐步被汉族、苗族等民族接受，成为各民族共庆的传统节日。



图2 古民居

2. 近代：动荡调整型“三交”阶段

近代以来，由于战乱、列强入侵、社会动荡等因素，海南多民族“三交”进入动荡调整阶段。这一时期，海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破坏，各民族的生产生活面临困境，“三交”实践受到一定的阻碍，但各民族之间的守望相助从未停止。在反抗列强入侵、抵御外敌的过程中，海南汉族、黎族、苗族、回族等各民族携手并肩、共同抗争，形成了“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情谊，进一步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结，强化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朴素认知。

同时，这一时期，海南的商品经济逐步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商贸交往逐步增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产品（黎锦、香料等）通过商贸渠道传入汉族地区，汉族地区的手工业产品、生活用品也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一定的经济联结。但由于社会动荡、交通不便等因素，这一时期的“三交”仍以地域型、自发型为主，交往范围有限、融合深度不足，各民族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地域隔阂与文化差异。

3.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引导型“三交”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海南多民族“三交”进入政策引导型阶段，“三交”的范围、深度与广度得到显著提升。1952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成立（后改为自治州），为海南多民族“三交”与民族团结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国家加大对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为“三交”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这一时期，海南各级政府积极引导各民族开展“三交”活动，通过推动人口流动、教育普及、文化交流等方式，打破民族隔阂，深化民族团结。例如，开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扶持工作，推动汉族教师到少数民族地区任教，少数民族学生到汉族地区求学，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之间的交往交流；举办民族文化节、传统体育运动会等活动，展示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引导汉族群众到少数民族地区投资创业，少数民族群众到汉族地区务工就业，形成了职业层面的“三交”互动。经过多年的发展，海南各民族之间的地域隔阂逐步消除，情感联结逐步加深，形成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良好氛围，为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三交”场域重构与共同体意识培育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海南的这一发展历程，是我国南方民族地区从“封闭隔离”走向“政策引导融合”的典型缩影，其积累的政策引导经验为全国民族地区开展“三交”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图3 汉代古居

（二）自贸港建设前海南多民族“三交”的场域特征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启动前，依托长期的“三交”历史传统与政策引导，海南多民族“三交”场域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格局，呈现出“地域集中、载体单一、互动浅层、多元共生”的鲜明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物理场域

自贸港建设前，海南多民族的居住格局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三交”的物理场域主要集中在民族聚居区域与相邻的汉族区域，场域边界较为清晰。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岛中南部的五指山、琼中、保亭等山区，

苗族主要聚居在黎族聚居区域周边的山区，回族主要聚居在三亚回辉村、回新村等特定区域，汉族则主要分布在海南岛的沿海地区与平原地区。

这种居住格局决定了“三交”的物理场域主要集中在民族聚居区域与汉族区域的交界处，各民族的交往互动主要发生在相邻的乡镇、村庄，场域的空间范围有限；同时，由于交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不同民族聚居区域之间的“三交”互动较少，场域边界较为清晰，形成了“各自聚居、相邻交往”的物理场域特征。例如，黎族群众与汉族群众的交往主要发生在县城、乡镇集市，苗族群众与黎族群众的交往主要发生在相邻的村庄，不同民族聚居区域之间的跨区域“三交”较为匮乏。

2. 载体场域

自贸港建设前，海南多民族“三交”的载体场域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以传统的生活型、生产型、文化型载体为主，新型“三交”载体较为匮乏。生产型场域主要是农田、山林、乡镇企业等，各民族群众在农业生产、林业种植、简单手工业生产中开展交往互动；生活型场域主要是村庄、集市、学校、医院等，各民族群众在日常生活、购物消费、子女教育、就医等过程中开展交往互动；文化型场域主要是民族节日庆典、传统体育活动、民间文艺表演等，如“三月三”“牛节”等民族传统节日，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这一时期，由于海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互联网、现代服务业等新型产业发展滞后，虚拟场域、职业型场域、开放型场域等新型“三交”载体尚未形成，“三交”的载体场域主要依赖传统载体，形式较为单一，难以满足各民族群众多样化的“三交”需求，也限制了“三交”的深度与广度。

3. 互动场域

自贸港建设前，海南多民族“三交”的互动场域呈现“浅层化、自发化”的特征，“三交”的深度与广度有限。从互动内容来看，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主要集中在生产生活的表层层面，如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日常生活的互助、简单的商品交易等，涉及文化观念、价值理念、情感心理等深层层面的交流较少；从互动方式来看，“三交”主要以自发为主，政府引导的“三交”活动虽然存在，但覆盖面有限、形式较为单一，难以推动“三交”从自发走向自觉。

同时，由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因素，部分民族群众之间存在一定的心理隔阂，缺乏主动开展“三交”的意识，导致“三交”的互动频率较低、深度不足，难以形成深度的情感联结与价值共识，也限制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例如，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由于语言不通，与汉族群众的交流较为困难，主要局限于简单的日常问候与商品交易，难以开展深层次的交往交流。



图 4 海口骑楼老街

4. 文化场域

自贸港建设前,海南各民族的文化呈现“多元共存”的格局,黎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鲜明,汉族文化、海洋文化等相互交织,但文化场域的融合不足,存在“多元并存、各自发展”的现象。各民族都注重自身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开展了一系列文化保护工作,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较少,缺乏有效的文化传播与交流载体,导致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认知差异较为明显。

黎族的黎锦、船形屋,苗族的银饰、刺绣,回族的伊斯兰文化等,虽然各具特色,但各民族之间对彼此文化的了解较少,难以形成文化认同;同时,由于文化传播渠道有限,少数民族文化难以被更多的汉族群众了解与接受,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也主要局限于表层面,难以实现深层次的文化融合,这也为共同体意识培育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总体而言,自贸港建设前的这种场域特征,在我国许多尚未全面开放的边疆民族地区具有普遍性,分析这一阶段的特征有助于理解开放政策对民族关系带来的结构性冲击。

二、自贸港建设对海南多民族“三交”的场域重构影响

2025年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自贸港的制度创新、产业升级、人口流动、文化开放等一系列变革,深刻打破了海南多民族“三交”的传统场域格局,推动“三交”场域发生系统性重构。这种重构不是对传统场域的否定,而是在传统场域的基础上,实现场域载体、互动方式、核心内容、运行逻辑的升级与变革,使海南多民族“三交”场域呈现出“多元化、开放化、深度化、一体化”的新特征,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物理场域

海南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口流动的加剧与区域发展的均衡化,彻底打破了传统“三交”物理场域的边界限制,推动“三交”物理场域的空间范围显著拓展,场域边界逐步模糊。

一方面,自贸港建设加大了对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乡村公路等交通网络逐步完善,打通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与沿海平原地区、自贸港核心建设区域的交通壁垒,使各民族群众的跨区域流动更加便捷。例如,五指山、琼中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相继通车,使少数民族群众能够快速前往海口、三亚等自贸港核心城市务工、求学、旅游,汉族群众也能够便捷地前往少数民族地区投资、创业、体验文化,推动“三交”物理场域从“相邻交往”向“跨区域交往”转变,空间范围显著拓展。

另一方面,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区域发展的均衡化,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推动了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五指山生态旅游区等一批重点项目在少数民族地区落地,使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与自贸港核心建设区域的联系更加紧密,物理场域的边界逐步模糊。同时,人口流动的加剧(包括省内各民族之间的流动、省外人口的迁入、国际人口的流入),使各民族群众的居住格局从“小聚居”向“互嵌式”转变,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迁入汉族聚居区域居住、工作,汉族群众也迁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投资、创业,形成了“互嵌式”的居住场域,为多民族“三交”提供了更广阔的物理空间。

这种物理边界的模糊化,是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民族地区空间重构的共性趋势,标志着民族交往从“地域邻近”向“功能互补”转变。

(二) 载体场域

海南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产业升级、互联网发展与文化开放,使海南多民族“三交”的载体场域实现多元创新,传统载体与新型载体共生共存,“三交”的载体形式更加丰富,覆盖面更加广泛。

1. 传统载体场域的升级

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传统“三交”载体场域的升级,使传统生产型、生活型、文化型载体的功能更加完善、覆盖面更加广泛。在生产型载体方面,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农业、林业、渔业等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升级,培育了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民族手工业等特色产业,推动各民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开展深度合作,例如,汉族企业与少数民族群众合作发展热带水果种植、黎锦深加工等产业,使生产型“三交”载体从传统的农田、山林,升级为现代化的产业园区、合作基地,推动“三交”从表层生产互动向深层产业合作转变。

在生活型载体方面,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城镇化进程,完善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村庄、集市、学校、医院等生活型载体的功能更加完善,各民族群众在日常生活、子女教育、就医养老等方面的交往互动更加便捷、频繁。例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医院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吸引了更多的汉族学生、教师、医务人员前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生活互动与情感交流。

在文化型载体方面,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升级了“三月三”、民族文艺会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传统文化载体,将其打造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平台,同时,推动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创等产业融合,使文化型“三交”载体的功能更加丰富,覆盖面更加广泛。

2. 新型载体场域的涌现

自贸港建设催生了一批新型“三交”载体场域,进一步丰富了“三交”的载体形式,推动“三交”向多元化、现代化转变。一是职业型载体场域的涌现,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培育了一批自贸港核心产业园区、企业,吸引了各民族群众前往就业、创业,形成了职业型“三交”载体场域,各民族群众在工作中开展深度交往互动,深化了职业情感与价值共识。例如,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海口江东新区等核心园区,汇聚了汉族、黎族、苗族等民族的从业者,各民族群众在工作中相互配合、相互学习,形成了良好的职业“三交”氛围。

二是虚拟载体场域的兴起,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发展,互联网平台、短视频、直播等新型传播渠道逐步普及,形成了虚拟“三交”载体场域,各民族群众通过网络平台开展文化传播、情感交流、信息共享,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三交”的互动更加便捷、频繁。例如,少数民族群众通过短视频、直播展示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生产生活场景,汉族群众通过网络平台了解、传播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认知提升。

三是开放型载体场域的形成,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的对外开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逐步完善,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外资企业、外籍从业者进入海南,同时,海南各民族群众也有更多的机会走出海南、走向世界,形成了开放型“三交”载体场域,使海南多民族“三交”不仅局限于国内各民族之间,还延伸到国际层面,进一步丰富了“三交”的内涵与外延。

新型载体的涌现表明,数字化与国际化已成为未来自贸港及开放型民族地区“三交”工作的通用方向,海南的探索具有先行先试的标杆意义。

(三) 互动场域

海南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多民族“三交”互动场域的深刻变革,使“三交”的互动方式、互动内容、互动频率发生显著变化,推动“三交”从浅层自发互动向深层自觉融合转变,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结与价值共识逐步深化。

1. 互动方式从单一向多元转变

自贸港建设前,海南多民族“三交”的互动方式主要以面对面的线下互动为主,形式较为单一;自贸港建设后,随着新型“三交”载体的涌现,“三交”的互动方式实现多元化转变,线下互动与线上互动相结合、自发互动与自觉互动相结合、个体互动与群体互动相结合。例如,各民族群众既可以通过集市、村庄、工作场所等线下载体开展面对面的交往互动,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线上的文化传播、情感交流;既可以自发开展日常的生活互助、生产合作,也可以自觉参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引导的“三交”活动(如民族文化交流节、民族团结志愿服务活动等);既可以开展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也可以参与群体层面的产业合作、文化展演、公益活动等,使“三交”的互动方式更加丰富、便捷。

2. 互动内容从表层向深层转变

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多民族“三交”互动内容的深度升级,从传统的生产生活表层互动,向文化观念、价值理念、情感心理、职业技能等深层层面延伸。在生产领域,各民族群众从简单的生产技术交流,向产业合作、技术创新、品牌打造等深层层面转变,例如,汉族企业与少数民族群众合作发展民族文创产业,不仅实现了经济利益的共赢,还推动了少数民族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产业联结与情感共鸣;在文化领域,各民族群众从简单的文化展示,向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文化创新等深层层面转变,通过共同举办文化活动、共同创作文化作品等方式,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在社会领域,各民族群众从简单的日常互助,向情感沟通、价值认同、责任共担等深层层面转变,在共同应对困难、共同推动自贸港建设的过程中,深化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情感联结,强化了共同体意识。

3. 互动频率从低频向高频转变,从自发向自觉转变

自贸港建设推动了各民族群众的跨区域流动与职业融合,使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互动频率显著提升,同时,随着“三交”载体的丰富与互动内容的深化,各民族群众开展“三交”的自觉性逐步增强,推动“三交”从自发向

自觉转变[5]。一方面,人口流动的加剧与互嵌式居住、工作格局的形成,使各民族群众的日常交往互动更加频繁,无论是工作中的配合、生活中的互助,还是文化中的交流,频率都显著提升,打破了传统“三交”低频互动的格局;另一方面,自贸港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使各民族群众深刻认识到,只有深化“三交”、加强团结,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因此,各民族群众开展“三交”的自觉性逐步增强,主动参与“三交”活动、主动学习彼此文化、主动开展合作交流的意识显著提升,推动“三交”从自发的、被动的互动,向自觉的、主动的融合转变。

(四) 文化场域

海南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文化的开放与融合,使海南多民族“三交”的文化场域发生深刻变革,打破了传统“多元并存、各自发展”的格局,推动各民族文化实现多元融合,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显著提升,为共同体意识培育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方面,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同时,也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通过举办民族文化交流节、传统体育运动会、文化展演等活动,展示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促进各民族群众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与认同;通过推动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创、互联网等产业融合,使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借鉴,实现文化创新与融合发展。例如,黎锦、苗绣等少数民族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文创产业融合,打造出一批具有海南特色的文创产品,不仅传承了少数民族文化,还被更多的汉族群众、国际游客了解与接受,促进了文化融合与认同提升。

另一方面,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的文化开放,外来文化与海南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使海南多民族文化场域更加开放、包容。同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为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重要的语言支撑,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破了语言障碍,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认知提升。

此外,自贸港建设推动了海南文化强省建设,深入挖掘苏东坡、丘濬、海瑞、冼夫人、黄道婆等历史名人的时代价值,讲好“更路簿”故事,挖掘“海上丝绸之路”等海洋文化资源,这些共同的文化符号,进一步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推动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海南文化场域的重构实践,为全国其他开放型民族地区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保护”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海南方案”。

三、场域重构中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现实困境

海南自贸港建设推动的多民族“三交”场域重构,为共同体意识培育带来了新机遇——拓展了“三交”空间、丰富了“三交”载体、深化了“三交”内涵,为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平台与更丰富的实践路径。但同时,场域重构过程中也伴随着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由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利益调整、认知偏差等因素的影响,海南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场域融合不足,“三交”深度有待提升

尽管自贸港建设推动了“三交”场域的重构,但目前海南多民族“三交”场域的融合仍存在不足,“三交”的深度与广度仍有待提升,未能充分发挥场域对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物理场域的互嵌与互动脱节。虽然自贸港建设推动了各民族群众的跨区域流动与互嵌式居住,但部分区域仍存在“居住互嵌、交往疏离”的现象。例如,在一些自贸港核心城市的社区,虽然有少数民族群众与汉族群众共同居住,但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生活习惯不同等因素,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互动较少,缺乏深层次的情感沟通与生活互助,物理场域的互嵌未能有效转化为“三交”的深度融合,难以培育深厚的共同体情感。

二是新型场域的“三交”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自贸港建设催生的职业型、虚拟型、开放型等新型“三交”场域,虽然为“三交”实践提供了新的载体,但目前其“三交”功能仍未能充分发挥。例如,在部分自贸港产业园区,各民族从业者虽然在工作中相互配合,但工作之外的交往互动较少,职业型场域的“三交”主要局限于工作层面,未能延伸到生活、文化等层面;虚拟场域的“三交”主要以文化展示、信息传播为主,缺乏深层次的情感交流与价值共鸣,难以形成有效的文化认同与共同体意识;开放型场域的“三交”主要局限于表面的文化交流,未能实现各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深度融合,也未能充分利用开放机遇培育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

这一困境警示我们,在推进全国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过程中,需警惕“物理互嵌”简单等同于“心理融合”的形式主义风险。

(二) 文化认同差异明显,融合难度较大

文化认同是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核心基础,只有实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才能培育牢固的共同体意识。但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多民族“三交”场域重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差异仍然明显,文化融合难度较大,成为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阻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各民族文化特色鲜明,认知差异较大。海南黎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渊源与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汉族文化、海洋文化、外来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黎族的自然崇拜、苗族的图腾文化、回族的宗教文化,与汉族的儒家文化、世俗文化之间,在价值理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民族群众之间的认知偏差与心理隔阂,难以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

二是文化保护与文化融合的矛盾突出。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推进,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保护意识逐步增强,担心自身文化被汉族文化、外来文化同化,因此,在文化交流中存在一定的抵触心理,注重自身文化的保护,而忽视了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同时,部分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较少、重视不足,缺乏主动学习、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意识,导致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难度较大,难以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

这些文化认同困境是开放环境下民族工作面临的共性问题,若不及时化解,可能影响全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的落实效果。

四、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对策

基于海南实践,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这些建议不仅适用于海南自贸港,也期望为全国其他开放型民族地区构建“三交”场域、培育共同体意识提供可复制的制度机制参考。

(一) 加强文化软性促进场域融合深度

1. 推动物理场域互嵌与互动深度衔接

(1) 构建互嵌式社区治理与服务体系

严格落实《海南省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2-2025年)》要求,在自贸港核心城市社区、少数民族聚居社区,建立“石榴红”服务站,配备兼具各民族语言能力的社区工作者,重点选拔黎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社区工作者参与基层治理,加强对社区工作者的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培训。推行“民族团结联户制”,将不同民族居民结对编组,每月开展1次“邻里互助日”活动,聚焦老人照料、子女入学、就业帮扶等民生需求,推动各民族群众在生活互助中加深情感联结;在社区公共空间增设“民族团结文化角”,摆放各民族文化书籍、民俗展品,定期组织民族美食分享、民俗体验等活动,打破语言与生活习惯壁垒。

(2) 强化语言沟通保障,夯实交往基础

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结合海南民族地区实际,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在少数民族群众集中居住的社区、产业园区,开设免费线上线下语言培训班,编写通俗易懂的双语学习材料,重点针对进城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群众开展培训,帮助其提升沟通能力。同时,鼓励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常用语言短语,在社区公告、公共标识中采用“国家通用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双语标注,营造“双向学习、彼此尊重”的语言环境,破解语言障碍导致的交往疏离问题。

(3) 推进互嵌式居住配套建设

结合自贸港住房保障政策,在保障性住房、人才住房分配中,明确各民族居民配比,避免单一民族集中居住;在社区配套建设中,融入各民族文化元素,建设兼具实用性与文化性的公共活动场地(如民族健身广场、民俗活动中心),为各民族群众提供常态化交往平台,推动物理互嵌向情感融合、行动融合转化,助力“琼岛石榴红”民族工作品牌建设。

2. 激活新型场域“三交”功能,拓宽共同体意识培育载体

(1) 深化职业型场域“三交”融合

针对自贸港产业园区特点,推动园区企业建立“民族团结共建机制”,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考核。依托园区工会、共青团组织,每月开展1次跨民族团结活动,推动各民族从业者从工作配合向生活互动、文化交流延伸;联合人社部门、职业院校,在产业园区开展“技能共建培训”,组织不同民族从业者结对学艺,既提升职业技能,又加深民族情谊,同时落实民贸民品企业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各民族群众就业,推动各民族群众在共同发展中凝聚共识。参考“五会合一”统一战线大群团改革模式,推动园区内各民族群体资源共享、平台互动。

(2) 优化虚拟场域“三交”质量

依托“理论琼崖”新媒体思想理论平台,打造“海南民族团结”专题线上平台,开设“民族文化分享”“自

贸港共筑梦想”等专栏,鼓励各民族群众分享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民族文化特色;举办线上民族文化交流节、知识竞赛、主题征文等活动,设置互动留言、直播连麦环节,促进各民族群众深层次情感交流与价值共鸣。同时,加强虚拟场域监管,规范网络言论,杜绝破坏民族团结的信息传播,引导虚拟场域成为“三交”融合与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阵地,融入“文化中国行”主题宣传。

(3) 提升开放型场域“三交”内涵

结合自贸港对外开放政策,依托博鳌亚洲论坛、消博会等国际平台,将各民族文化展示与自贸港开放形象宣传相结合,组织民族文化精品参与国内外展会,让海南特色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在自贸港旅游景区、免税购物区、国际会展中心等开放场所,设立民族文化展示区、体验区,邀请各民族传承人现场展示民俗技艺(如黎族纺染织绣、苗族银饰制作),既向外来游客展示海南多民族文化魅力,也推动各民族群众在共同展示、共同服务中增强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办好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赛事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二) 提高文化黏性协调场域融合博弈

1. 搭建文化交流平台,缩小各民族认知差异

(1) 常态化开展民族文化交流活动

落实《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条例》,将“三月三”等民族传统节日打造为品牌活动,每年举办全省性民族文化艺术节、民俗展演、文化论坛等活动,组织各民族群众集中展示文化特色、交流文化成果;推动各民族聚居区开展“文化互访”活动,定期组织汉族群众走进少数民族村寨,体验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同时组织少数民族群众走进汉族城镇,感受现代文明与汉族文化,加深彼此了解与认同。创新开展“村FA”“村BA”等群众性体育活动,结合“全民健身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开展特色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在体育运动中增进交流、凝聚共识。

(2) 强化民族文化教育普及

将各民族文化、民族团结知识纳入海南各级各类学校课程体系,推广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华民族大团结》等统编教材,在中小学开设民族文化选修课、举办民族文化社团活动,培养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实施“‘铸牢’教育教师全员提升计划”,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教师培训内容。在高校、职业院校开展民族文化研究与交流活动,依托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和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深化南海文明和海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推动各民族文化研究成果转化,拓宽文化认同渠道。

(3) 打造民族文化融合传播矩阵

整合海南广播电视台、海南日报、新媒体平台等资源,开设民族文化专题栏目,制作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筑自贸港梦想的纪录片、短视频、公益广告,常态化传播各民族优秀文化与民族团结故事;建设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和主题展馆,在城市中心、重点社区的公共文化场所设立“石榴红”中华文化体验区(角),打造升级民族地区县级文化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让各民族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加深文化认知与情感认同。

2. 平衡文化保护与融合,构建“多元一体”文化认同

(1) 完善民族文化保护与融合政策体系

以《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条例》为核心,结合自贸港建设实际,修订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明确“保护为主、合理开发、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既加强对黎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系统性保护,建立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名录,抢救濒临消失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设立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之乡,又鼓励各民族文化创新融合,支持民族文化与海洋文化、外来优秀文化、现代文明深度融合,避免“保护与融合对立”。落实中共海南省委部署,制定海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为文化保护与融合提供制度保障。

(2) 推动民族文化创新性融合发展

实施“民族文化+旅游”“民族文化+康养”等融合发展工程,依托民族地区生态与文化资源,开发沉浸式体验项目和特色产品,推动黎锦、琼剧、民族医药等项目与旅游、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引导各民族群众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打造民族文化品牌;鼓励文化创作者挖掘各民族文化中的共通元素,创作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自贸港建设风貌的文艺作品(如歌曲、舞蹈、影视剧、书画),办好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用艺术形式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增强各民族群众的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挖掘苏东坡、丘濬等历史名人的时代价值,讲好“更路簿”故事,推动各民族文化与海洋文明传承深度融合。

(3) 强化文化尊重理念培育

将民族团结教育、各民族文化知识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社区宣传、企业员工培训的重要内容,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常态化机制,组织省级宣讲队伍开展全省范围内的宣传教育,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引导汉族群众主动学习、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摒弃认知偏差;同时,加强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引导,宣传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鼓励其在保护自身文化的基础上,主动参与文化融合与创新,树立“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理念,破解文化保护与融合的矛盾,构建“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助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通过上述路径,海南有望形成一套适配高水平开放环境的民族治理体系,为全国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贸港智慧”。

参考文献

- [1] 张伦阳,王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逻辑、现实基础和实践路径[J].民族学刊,2021,12(01):10-18+84.
- [2] 郝时远.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06):1-10.
- [3] 封关启新程同心向未来以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助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J].中国民族,2025,(12):26-28.
- [4] 张萍,齐传洁.十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综述[J].贵州民族研究,2020,41(05):73-80.
- [5] 徐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途径[J].学术探索,2025,(08):77-86.

Reconfiguration of the Field of Ethnic "Three Interactions" and Cultivation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trategy:

A Case Study of Hainan

Wang Peng^{1,2,*}, Huangfu Zhengtong^{1,2}, Song Bo¹

(1 Hai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cation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China ;2 PioEntropy Academy, Xiamen, Fujian 361015,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is a major strategic measure for the country's high-level opening-up and an important practical field for ethnic work to serve China's modernization. As the only provincial-level all-region free trade port in China, the field form of multi-ethnic "three interactions"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Haina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reconfigu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losure operation. This process not only concerns the ethnic unity in Hainan but also provides a pioneering and trial sampl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open ethnic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Based on the field theory and community theory, this paper places Haina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trateg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multi-ethnic "three interactions", and analyzes the reconfiguration mechanism of the physical, carrier,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fields brought about by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free trade por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trade port expands the space of "three interactions" while also facing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field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difference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optimized paths for the field of "three interac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dapted to the high-level open environment,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xperience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penness through the Hainan practice.

Keywords: Hainan Free Trade Port; Multi-ethnic "Three Interactions"; Field Reconfiguration;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Ethnic Governance